

本报副刊部主编 | 第1090期 |
2026年1月4日 星期日
本版编辑:吴南瑶
视觉设计:戚黎明

星期天夜光杯

葛剑雄 步履不停的追问者

◆ 安介生

■ 葛剑雄



每年12月15日,弟子与师友们总会不约而同地聚在复旦园。这并非正式的学术会议,而是一场温暖的约定——为葛剑雄先生庆贺生日。今年,同道们笑语盈盈,先生精神矍铄。葛先生风趣地说:“八十,好像只是上海老人寿命的平均值!实在用不着什么祝贺,不过,历史地理学科的传承与发展却是一件大事

啊!”“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了,你们一定要好好锻炼身体,为国家多干几年!”言谈间,没有丝毫功成身退的暮气,反倒像一位整理好行装、随时准备再次出发的旅人。此时此刻,他也在南非跨年旅程中。

对先生而言,八十一岁,不过是又一个扎实的起点。

从毫末到合抱

1945年12月,他出生于浙江吴兴县南浔镇,少年时迁居上海。高中时代成绩优异的他,却因患肺结核休学一年半,最终与高考失之交臂。在老师的建议下,他于1965年进入上海古田中学,成为一名英语教师,一教便是十余年。这段经历未曾消磨他的向学之心,反而在扎实的教学实践中沉淀下严谨与耐心。1977年,三十二岁、仅有高中学历的葛剑雄,凭借出色的教学成绩被评为上海市教育战线先进工作者,并当选市人大代表。也是在这一年,改革开放的春潮初涌,研究生招生制度恢复。他抓住了这扇豁然敞开的时代之门,以初试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,师从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。

这段非同寻常的经历,被他在闲谈中化作激励后学的素材,并没有一丝怨天尤人之态,而是充满了自豪。他内心对那个时代的感激是具体而微的——它让一位优秀的中学教师,得以凭借纯粹的学识叩开最高学府的大门,并最终成长为新中国首批自主培养的文科博士之一。在谭其骧先生身边的十余年间,他作为助手参与大量高层学术活动,于耳濡目染中深刻体悟了一代宗师的治学风范与家国情怀。这份早年的滋养,奠定了他学问的底色:既要深扎于“地”的坐标,更须关切创造历史的“人”。

古语云:“合抱之木,生于毫末;九层之台,起于累土;千里之行,始于足下。”谈的都是基础的重要性。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是中国学术界之重镇。笔者以为,史地之所以受到众多学者的推重,是因为自史地所的创始人谭其骧院士与众多前辈开始,都甘心为学术界做最基础性的工作,从而为中国学术界的前行搭建了更高、更科学、更稳固的平台。谭先生和他们那一辈学者最大的功绩就是八册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。而这八本图集解决的就是一个“地”的问题。历史书籍中有无数地名,如果不知道其确切的位置,那么,后人的读史,就成为“盲人摸象”与“悬空之虚说”,哪里谈得上什么准确性与科学性?八册的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出世后,从此,历史研究及大众阅读史籍,就有了一个非常坚实而崭新的平台,数以千计的古代地名有图可查,其科学价值、影响及作用是难以估量的。国内外学术界高度认可八册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的贡献,其原因正在于此。

而葛先生将自己的学术关怀与研究焦点放在了“人”身上。我们所说的历史,都是“人”的历史,没有“人”,哪有历史?然而研究某个人的历史,其意义肯定是有限的。组成社会需要一定数量的人,而一定数量的人就是“人口”。研究社会与历史,都离不开人口研究。葛先生很早就有了撰写中国人口历史的长远规划。他认为:“就像国民应该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一样,中国公民也都应该了解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。专业研究人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”而葛先生之所以长期坚持中国人口史研究计划,还曾受到一位国际学者“B教授”的刺激与激励。这位“B教授”声称:他从来采用中国学者的说法与证据。其傲慢的态度引起葛先生极大的愤慨。他在《中国人口发展史》的《前言》中写道:“只要我们自己还没有拿出举世公认的人口史研究成果来,B教授之流就还会有市场。”也许正是这股不甘于服输的骨气,成为葛先生数十年来冲破重重困难,完成一流的人口史研究成果的重要动力。他主编的多卷本《中国人口史》拿到多种社科奖项,他个人所撰《中国人口发展史》也多次再版,并被翻译成英文出版发行。他用自己的成果在学术界维持了一位中国学者的尊严。

2

师者的温度与豁达

追随葛先生问学,恰似“如沐春风”。这春风,并非一味和煦,更带着催生新绿的明晰力量。前些年,葛先生曾被复旦学子评选为“最受学生喜爱的导师”之一。在学生眼中,葛先生教学与科研工作的最大特点,就是实事求是的求真态度与“凡事一分为二”的豁达与明辨精神。

熟语云:“打铁还需自身硬。”一名成功的教师首先要有过硬的本领。传授的核心应该是研究方法论,而不是所谓客观“知识”。传统时代,对于史家要求有“三长”说法,即史才、史学与史识。其中,史识最为可贵。作为一位学者,葛先生最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能够提出自己独特的观点,既接地气,又具世界眼光。如中国人口庞大的基数,曾引发不少国际人士的担忧。对此,葛先生并没有丝毫回避与迟疑,而是坚持从学术立场表达自己的研究成果。他指出:“从秦始皇建立中国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,中国本身的人口压力从来没有成为向外扩张的原因,也不是开拓疆土的动力。”历史上“虽然中国的人口从数千万增加到了19世纪中期的4亿多,但都是依靠本国生产的食物供养的,从未产生过向境外寻求生存条件的企图,因此中国的人口数量从来没有构成对外部世界的威胁。”这种一针见血的真知灼见,不仅是葛先生深思熟虑的学术成果,更体现出他关心世事,回应关切的高度智慧。这无疑也是学术研究经世致用的完美体现。

如果说葛先生主编《中国人口史》就是解决一个“历史上中国人口到底有多少”的问题,那么他主编的《中国移民史》就是解决“中国人口从哪里来”的问题。关于中国移民史研究的重要性,葛先生郑重指出:“离开了移民史就没有一部完整的中国史,也就没有完整的经济史、人口史、疆域史、文化史、地区开发史、民族史、社会史。”“移民对于中国的伟大贡献,只有认真地加以研究与总结,我们与我们的后人才能了解先民们的光辉业绩,并使之发扬光大。”这是何等炽热的治学情怀,这又是对历史何等负责任的态度!也许只有这样的情怀、态度与责任感,才能解释数十年来葛先生为中国移民史研究付出的艰苦努力。

除了治学态度与学术方法之外,追随恩师感受最深的地方,是他对学生的宽容与鼓励。而鼓励学生超越自己,则正是教育者的“至高境界”。葛先生特别鼓励学生勇于提问,他乐于见到学生提出独立见解,甚至挑战权威。我曾因对前辈大师的某个观点产生疑问而忐忑,葛先生认真听后的一句“你的想法有道理”,如同点燃火种的引信,让我瞬间化忐忑为信心。他在为学生著作作序时,能毫无保留地写下“我们的学生已经在很多方面超过我们”,这份喜悦与豁达,源自一位真正教育者的深厚底气与早年身为教师的朴素信念。他厌恶教条与空谈,崇尚“实事求是”到了近乎执着的程度。这或许与他早年的教学经历有关——站在中学讲台上,必须把复杂的道理讲得清晰透彻。他总强调,历史地理学绝非地名仓库,而是一套理解人地关系的方法论;掌握观察世界的框架,远比死记知识更重要。

3

一个人就是一部队

2023年,时年七十八岁的葛先生从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任上荣退,然而未歇多久,香港中文大学(深圳)图书馆馆长的聘书又交到手中。他欣然接受,开启了沪深双城奔波的“新常态”。即便年过八旬,他依然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》第二册的执行主编,并在复旦大学与港中大(深圳)两地指导着多名博士生。2025年,他出版了《何以中国》《也是读书》等多部著作,并完成了《谭其骧学术传记》。他在第十八届国际历史地理学家大会、联合国“大河对话”等多个重要场合发表主题报告,从历史地理角度阐释中华文明。正如他所说,这一年他“至少完成了两份正常工作量”。对他而言,学术生产已是生命自然流淌的一部分,无所谓“退休”的界限。在他的办公室,写字桌上来自南极的石头是他“行万里路”的无声注脚。他的学术世界,始终与脚下的大地和时代的呼吸紧密相连。他研究人口史、移民史,不仅是为回答学术问题,更深藏着理解中国何以形成的钥匙。

2022年,他登上B站讲授《中国史》;他甚至担任热门游戏《王者荣耀》的学术顾问,以严谨又鲜活的方式,把历史讲给更多年轻人听。他的普及著作《大地上的中国史》在港出版,旧著《四海之内》发行近三万册,这些努力都指向同一个方向:让学术走出象牙塔。

他的行程表揭示着一种令人惊叹的活力。沪深两地馆长职责、学术会议、各地讲座,他独自安排一切,不带助理。一只行李箱便是他出差的标准行头。有人建议他带个助手,他摆摆手,满满“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”的从容。为了与同事沟通更便捷,他近几年学会使用微信。2025年,他乘坐120次飞机,足迹遍及3大洲26城,飞行超20万公里。对比2019年的飞行数据,他笑言“毕竟老了6岁!”这是一种充满自律与热情的生活状态,既有与家人同游海岛的闲暇,更有为学术与责任奔走世界的勤勉。

面对未来,他清晰地调整着目标:“原来计划轻松工作到八十五岁。现在需要调整为正常工作到八十五岁或更久。”驱动这份“正常”的,是具体的责任——为了却先师谭其骧先生的遗愿,参与主持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新一轮修订。他知道“这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”,正因如此,八十一岁这个“新起点后面会是一个较长的时段”。

扫码看视频



悦读如恒
题赠新民晚报
夜光杯的读者
葛剑雄
2025年元旦